

在香港做藝術家真不爽，總是不能理直氣壯的。有時朋友介紹我時會說我是藝術家，對方總會問：「那你的正職是什麼？」好像藝術不可能是正職似的。就如曾德平四年前在報紙說過「視藝工作者一直被視為組織能力弱、不擅於交際、不按時限辦事、生活浪漫荒唐、不食人間茶飯煙火、不務正業情緒化吊兒郎當不求上進、想做就做散髮披肩不修邊幅目中無人六親不認閉門造車不知所謂...」大部分香港人對藝術家都沒好感沒興趣。

我媽媽是個一般的香港人，草根出身，從來不知我四年在大學讀藝術是幹嗎的。當年我選讀藝術系，媽媽有點擔心問我：「將來你畢業，可以做什麼？」我沒嚇她說要做藝術家，我只說可以教書。

九四年搞了個展後，展覽的邀請一個接一個來，我來者不拒，起勁地做起藝術來。有時做到通宵達旦，時常不回家吃飯，時間一長，媽媽問我：「晶瑩，你要玩到幾時，才正正經經做一些事！」我沒作聲，心想，我是很正經地做藝術的，我做有關月經的展覽，名稱也叫「正經事」。當然媽媽指的正經事是找一份有前途的政府工作或在銀行做事，可以拿低息貸款供樓。

許多香港藝術家也好像我一樣，不大會邀請家人看自己的展覽，不會和家人談自己的作品，自己的想法。要他們欣賞我們用垃圾、用禁忌物件、挑戰美觀的作品，難過登天。但若有心，總是有機會的。

九六年做一個舞台裝置，要在一個星期內做三千朵衛生巾雞蛋花。每朵花要用七分完成，一個熟手技工(我)不眠不休也要十五天才能完成。那時死線迫在眉睫，於是硬著頭皮叫朋友和家人幫忙。我急得快瘋了，叫大弟幫忙，他說：「你自找的，我沒興趣。」叫媽媽幫忙，她卻爽快地答應了。那時候，媽媽、小弟和朋友一起在麥哥利小劇場幫我，那裏好像山寨廠一樣分工做花，其中媽媽最落力，她好像廠長一樣，招呼我的朋友，預備工具，檢查產品的素質，更在技術上提出不少建議。例如我堅持要「true to material」，用真雞蛋。媽媽覺得我相當窩囊，橫豎離台那麼遠，是真雞蛋是乒乓球，是沒有人會分得出來。她更特地買一些乒乓球試做給我看。我最終也接納了她的建議，省掉不少時間。我在朋友面前談笑風生，媽卻知道我其實擔心，主動問我，要不要她請假來幫我，我感動得想流淚。她對藝術沒有興趣，卻盡心盡力幫我。

我想媽媽能更愉快地幫我，趁機會告訴她我的創作意念，說完一輪文化批評和藝術史，她一臉茫然，頓了一頓，她說：「你做那麼多怪東西，有時我會懷疑你是否有精神問題。」我沒好氣再說。後來用了另外一個的方法來向她解釋，我告訴她我得了什麼什麼獎，做作品可以收到創作費。其實，我從來也不相信藝術可以用來評審、頒獎，有創作費亦不等於作品好，但這個方法比較有效。她好像比較明白了，會較認真聽我說創作意念。她還從我的作品聯想起我的出生故事；有人批評我的作品時，為我解釋。藝術上，她多了支持我，大家亦多了溝通，感覺相當良好。

我和媽媽是兩個世界的人，但其實也可以找到可以溝通的地方。有時她簡單直接的想法，也可以很有啟發性。她人緣好，有次跟她到街市買菜，途中她不斷碰到熟人，我奇怪她竟然認識那麼多人，她說跟那些人在街市時常碰面，自然便認識了。對於我這個已經適應了現代人疏離關係的人，媽媽是相當正面的例子。

九八年至二千年，我到三藩市留學。那邊的藝術氣氛很好，一般人對藝術都有認識，做藝術家可以理直氣壯。但對著大堆友善但難以深交的美國人，我還是比較掛念在香港的媽媽。